山西考古文集

有实其积

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華誕文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实其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华诞文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8
ISBN：978-7-203-07862-3
定价 268.00 元

【中图法分类号】K872.25-53（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国文物考古＞地区文物考古）

【内容提要】 本书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华诞纪念文集，收录了常年在山西从事考古工作的省外考古专家学者、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调往全国文博机构的人员以及该所离退休及在职的考古人员提交的论文80余篇，分为回顾和学术两部分，涉及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发展中的人、事、物的回忆，山西各个时期考古学课题的研究及山西考古事业发展新领域等方面的内容，全面展现山西考古发展史和山西考古学最新科研成果。

【参考文献格式】本社编．有实其积 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华诞文集．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08.

序言

山西，地处河东、山右，有着黄河水系滋养的丰沃，在地壳隆起的作用下，被吕梁、太行山等山系自然分割出南北几个地理单元。自古疆域广狭、关河险夷的三晋大地，从有人类生存的原始社会开始，便孕育出文明星火。

作为华夏文明起源的重心腹地和南北、中西文化汇通的重要枢纽，山西的人文历史之深厚，自然被纳入考古学研究视野，在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26 年 10 月，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开创了山西考古也是中国考古的历史。自那时起，山西的考古工作已走过了 80 多年，但是早期的考古无论田野工作、人员组织还是学科建设均未步入正轨。直到解放后，山西才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考古队伍，踏上了漫漫求索的道路。1952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山西省文物考古科研机构的正式成立。以此为前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已走过了 60 个年头。

1952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下设的勘察组负责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调查发掘和文物普查工作，这是山西独立进行考古工作的开始。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长治工作站的相继成立，极大地促进了山西考古工作的展开，山西逐步进入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阶段。

虽然当时基础设施落后、工作环境差，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怀着乐观向上的情绪，扎根在田野中，为发掘保护重要遗址、探索新知默默地耕耘。这时期许多重要遗址，如西侯度遗址、丁村遗址、峙峪遗址、匼河遗址、东下冯遗址等的发现和发掘，为探明山西远古历史沿革、了解山西古代历史文化面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长期进行考古工作的侯马晋国遗址，更是集结了全国的力量，打造成一片培养人才的摇篮沃土，它将田野考古、历史文献、社会文化、科学艺术等综合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它与长治分水岭墓地为中心的“阵地”发掘为山西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时期的山西考古工作因为有了一批优秀实干的考古工作者，而为未来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局面。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山西的考古工作也进入了停滞状态。

1979 年 11 月，省政府撤销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成立山西省文物局，原有的考古队、侯马工作站、长治工作站合并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直属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的考古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的田野考古工作全面展开，东至太行、西至黄河、北至大同、南至中条山处处都留下了考古人的足迹。这期间发掘的枣园遗址、北撖遗址、陶寺遗址、白燕遗址、天马—曲村遗址、娄睿墓、赵卿墓、虞弘墓等工作为我们研究华夏文明起源、晋文化、山西历史时期文化特征等课题提供了丰富的文物资料。

这一时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基础设施和组织管理上不断发展，太原和侯马文物库相继建成，积极促进人才引进和培养，成立山西省考古学会，召开重要考古会议，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奋发向上的考古队伍。

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山西的考古工作也突飞猛进。为了配合国家和省重点工程的建设，省考古所做了大量基本建设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许多重要的被历史掩埋的遗址逐步被世人所知，如柿子滩遗址、清凉寺墓地、横水墓地、高红遗址、大河口墓地、云冈窟顶遗址等。除本省基本建设考古之外，省考古所还积极树立全局意识、课题意识，积极参与三峡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工作和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项目。在科学发掘的同时，省考古所更加注重现场文物保护和科学管理，技术上不断创新，工作作风上更加严谨。这一时期先后有 8 个考古项目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8 个考古项目分别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其中绛县横水墓地与翼城大河口墓地均荣获了“田野考古一等奖”。

六十年的积淀，六十年的探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紧紧围绕我省考古事业，在国家与省内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山西考古人的筚路蓝缕、开拓进取，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已发展成为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考古学研究、考古知识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考古部门，担负着全省境内地下文化遗产的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等工作，成为我省考古行业的中流砥柱。

希望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接再厉，在新时代、新挑战、新机遇面前，不断进取、勇攀高峰、全面发展，为山西乃至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山西省文物局局长

前言

2012 似乎注定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有不少的考古机构都在纪念这个特别的考古之年。4 月 28 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隆重庆祝北大考古 90 年、考古专业 60 年。8 月 8 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 60 年庆典。8 月 28 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 60 年庆典。我们不约而同选择带“8”的日子来庆祝 60 年这个时间节点，应该说代表了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温故知新，继往开来，共襄发展。

1921 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1926 年，中国学者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这三个重要的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均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基于认识不同学术界也相应产生了中国考古学诞生的三个标志。实际上，无论以哪个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都有一定道理，我们不必为此纠缠。因为某一遗址的发掘是偶然的，但中国考古学呼之欲出的那一时刻是必然的。从那一刻起，中国考古学就注定了同河南同山西的特殊关系。

1926 年，从美国哈佛人类学系学习归来的李济博士在汾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夏县西阴村遗址，并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西阴遗址的发掘不仅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更是我国自主实证探索中华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作为山西考古的发轫之功被载入史册。从那时算起，山西的考古事业已经走过了 85 个年头。此后虽然还有董光忠 1930 年对万泉县阎子疙瘩遗址的发掘和 1931 年对万泉荆村遗址的发掘，但是早期考古工作并未步入正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才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考古队伍，踏上了漫漫求索的道路。1952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勘察组的建立，标志着山西省内考古科研机构的正式成立。以此为前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已走过 60 个年头。

60 年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计发掘百余处重要古代遗址和墓地，抢救保护珍贵文物数以万计；60 年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出版图书 60 余部，发表各类文章 1500 余篇；60 年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造就了近百位考古学者，他们为山西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几代山西考古人的辛勤耕耘，今天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已发展成为集考古科学发掘、文物科技保护、考古学课题研究、考古知识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考古部门。60 年承载了太多的世事沧桑，历史的变迁、机构的演变、个人的成长、事业的发达等等不一而足。回首 60 年的风雨过往，在感慨光阴易逝的同时，也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从无到有、点滴汇聚的不断前进而欣慰鼓舞。60 年值得回顾与反思，因为我们要温故而知新；60 年值得纪念与庆祝，因为我们要继往而开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站在60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精心策划组织一系列相关图书的出版，以此来庆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六十华诞。其中《千耦其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历程》、《有实其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华诞文集》两本是专为六十华诞所出的纪念图书。前者总结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60年的历程，从机构设置、领导班子、科研人员、发掘项目、科研成果，奖励奖项、大事记等方面一一梳理，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60年的整体印象。后者则汇集了省内外学者有关60年山西考古的回忆和学术文章80余篇，从不同角度述说了点滴往事和探讨了一些问题，表达了与山西考古风雨同舟的学者们的丝丝情怀，是他们献给山西省考古研究所60周年的一份厚礼。

《诗经·周颂·载芟》是一首赞美周王带领众人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祭社酬神、欢乐安康的颂歌，歌中有字句“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载获济济，有实其积……”生动描绘了众人耕耘收获的欢乐场景。我们借其中“千耦其耘，有实其积”两句来表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耕耘与收获的喜悦心情，并且用为两本纪念图书的书名，可谓言于词表，恰如其分。

千耦其耘，六十载考古观五千年华夏文明沧桑巨变；有实其积，一甲子探索映二三代山右学人心路历程。我们坚信，以此为新起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将会继续秉承考古人艰苦朴素的精神、依靠奋发向上的团队力量、树立科学创新的时代意识，必将谱写出一曲山西考古新篇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3

第一篇 回顾篇 1

第一节 见证蹒跚起步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52-1984） *2*

第二节 艰难起步铸辉煌改革开放初期的山西考古所——忆王建先生二三事 *5*

第三节 四面开花八方齐鸣 *8*

第四节 历史性的跨越——1992-1995 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11*

第五节 奔向新世纪的山西考古工作（1995-2002） *14*

第六节 新世纪之初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2-2006） *17*

第七节 脚踏实地继往开来（2006-今） *20*

第八节 六十年来山西考古学术成果之回顾 *23*

第九节 从技术到科技 *26*

第十节 在路上——记山西公众考古探索之路 *29*

第十一节 为了共同的目标 *33*

第十二节 考古情缘六十载——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西考古 *37*

第十三节 回眸片语兄弟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山西 *44*

第十四节 难忘山西难忘侯马 *47*

第十五节 回忆在山西的考古往事 *50*

第十六节 陶寺城址发现的回顾 *53*

第十七节 三晋考古学行纪事 *56*

第十八节 化作春泥更护花——忆山西文物界的泰斗崔斗辰同志 *62*

第十九节 从《石片形制探究》谈起——怀念考古道路上的三位导师 *65*

第二十节 迟到的礼物 *71*

第二十一节 一个瘦弱的身影——忆张彦煌先生 *72*

第二十二节 王择义有关丁村遗址的发现及发掘后工作情况的几份遗稿 *76*

第二十三节 怀念父亲——我眼中的父亲杨富斗先生 *80*

第二十四节 不能忘却的怀念 *86*

第二十六节 难以忘怀的事 *90*

第二十七节 侯哥侯哥 *94*

第二十八节 漫谈考古工作、研究与“读书得间”二三事 *96*

第二十九节 我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与成长的 26 年 *104*

第三十节 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点往事与趣事 *106*

第三十一节 考古人生摇篮在晋 *109*

第三十二节 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114*

第三十三节 难忘的记忆 121
第三十四节 历史片断的记录 125
第三十五节 温故三十年 130
第三十六节 踏上文博考古之路——从英语翻译到夏商周考古 141
第三十七节 怀念 20 世纪 90 年代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 144
第三十八节 丁村杂记 157
第三十九节 忆林遮峪商代遗址的调查 162
第四十节 留在黄河边的岁月 164
第四十一节 横水墓地考古随记 170
第四十二节 西周墓地考古方法杂记——从横水和大河口墓地谈起 181
第四十三节 1926 年李济发现浮山蛟头河的调查 187

第二篇 学术篇 193

第一节 泥河湾盆地——人类演化摇篮 194
第二节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与石制品分类的思考 203
第三节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科建设的战略思考——兼谈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保护 211
第四节 丁村遗址年代研究进展 221
第五节 3S 技术在旧石器考古中的应用——以吉县柿子滩遗址为例 227
第六节 神权与文明 232
第七节 晋南地区仰韶晚期遗存试论 243
第八节 清凉寺史前墓地与运城盐湖的早期开发 251
第九节 垣曲古城东关出土石制品分析 259
第十节 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研究中的问题续谈 262
第十一节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钺及相关问题 272
第十二节 山西土鼓检索 275
第十三节 晋东南地区龙山晚期与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基本认识 278
第十四节 东太堡文化遗存文化因素分析 281
第十五节 晋中二里头时期遗存的分期及相关问题初论 290
第十六节 运城盆地聚落考古再思考 301
第十七节 山西商代考古学研究述评 308
第十八节 对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的再思考 324
第十九节 山西先周考古学文化的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的探讨 327
第二十节 晋侯墓青铜礼器与明器分析 333
第二十一节 晋国腹心地区文化浅说 335
第二十二节 范氏，“先”族乎？——晋国卿族“先”与范氏之族属 341
第二十三节 简论横水与大河口墓地人群的归属问题 346
第二十四节 西周时期的晋南政治格局——从晋、霸说起 353
第二十五节 新发现的异姓封国研究 361
第二十六节 吴太子专戈考 373
第二十七节 长治出土铁器的金相学研究 375
第二十八节 试论山西汉代城址 379
第二十九节 汉代墓碑形体溯源 390
第三十节 浅谈山西北魏墓葬中的乐舞图像 392
第三十一节 鲜卑的辫发习俗 402
第三十二节 北魏墓葬绘画中的“宴饮图” 404

第三十三节 南涅水石刻的地域特色..... 408
第三十四节 太原外来文明之葡萄美酒——从太原出土虞弘墓考古资料谈起..... 414
第三十五节 墓龙浅说..... 420
第三十六节 浅谈汾阳东龙观金代墓壁画的摹绘..... 425
第三十七节 晋南地区金代砖室墓丛葬现象探讨..... 427
第三十八节 “玉兔捣药”图像的考古学探源..... 432
第三十九节 金元时期山西地区钧釉作风的流布..... 434
第四十节 基建考古诸问题与认识..... 439
第四十一节 大众传播与考古报道..... 449

第一篇 回顾篇

第一节 见证蹒跚起步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52-1984）

口述：张颔 整理：郝丽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写这个题目，需要先说明我与文物行业的渊源。

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政府组织和许多专门性的机构陆续成立。山西省委也是在1950年春天成立的，最初我就在省委统战部工作。当时省委保管着一批文物，这批文物是由一个叫何泽农的先生随太原解放带进城的。因为自己对古物有强烈的爱好，就经常去文物室观摩，做一些研究。1952年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文管会”）成立，这批文物就归了文管会。当时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崔斗辰兼任文管会主任，我们私交不错，又有对文物的共同兴趣，就聘我当了文管会的顾问。

新成立的文管会设了勘察组、古建组、保管组三个职能部门，时任襄陵文化馆馆长的畅文斋被调来担任勘察组的组长，副组长是郭勇。文管会在外单位陆续聘请了一些学者当顾问，包括我、崔子恒，还有山西大学的阎宗临和郝树侯。虽然只是顾问之一，但文管会的情况还是知道一些，那个时候的考古工作主要就是勘察组来做，配合基本建设搞考古调查发掘、响应国家政策进行文物普查，也培养了一些山西自己的专门人才。我自己也做过一些个人的调查，那是1957年秋天，统战部派我去长治和高平下乡检查工作，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对位于那里的长平古战场进行了考察和访问，就文献中记载的“秦长垒”、“赵东垒”、“赵西垒”、“赵壁”、“秦坑”的位置，以及秦军遮绝赵军后援的道路等问题，一一作了勘定和分析，写了《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发表在1959年的《山西师范学院学报》上。那时候还没有考古方面的知识，全是出于兴趣，喜欢看书，喜欢思考问题。

1958 年，全国各领域都在搞大跃进。上面下了通知，要求各省都要成立中国科学院的省级分院。于是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就挂牌成立了，成立分院得有几个专门类别的研究所，有哪个没哪个都行，山西不能没有考古所。这就是山西最早的以考古命名的机构——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

这个考古所与文管会没有关系，主要的考古工作其实主要还是由文管会勘察组来做。省委文教部部长王大任在省委会上提议我来当所长，统战部部长郑林也同意，这样我就从统战部调到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走马上任了。

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成立之初位于大中寺对面剪子巷的一个院子里，进去有两层楼。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刚从统战部到山西分院考古所任所长的时候，全所只有 3 名工作人员，组织上安排的两个人，一个是大学生叫梁秀芝，一个是共产党员叫张宪哲。刚配上鞍鞯，便要出征打仗。这年冬天，接到任务说要在山西举办华北地层会议山西现场会。山西有几处重要的标准剖面地层，包括石盒子—石千峰系，位于太原；忻州宁武有骆驼脖子砂岩。我作为大会副秘书长过了年就开始筹备。会议于 1959 年 7 月 1 日～12 日举行，郭沫若来参会，我邀请他给考古所题写所名，后来题字也不知道去向了。

1959 年夏天，政策又突然发生了变化，为了反“冒进”，上级决定撤销全国各省的分院，刚组建不久的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所面临着新的选择，考古所将何去何从？省委文教部王大任主任找我谈话，推荐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山西大学，一个是文管会。我因为是文管会的顾问，对那边的情况熟悉些，就说到文管会吧。

就这样，1959 年 5 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 年由山西省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更名）、山西省博物馆、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所三个单位合并，统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我担任副主任，兼任考古所所长。文物工作委员会也从帽儿巷搬到了文庙。

当时的考古所没挂牌子，没有独立的人员编制，没有专题研究项目，我刚来，也拿不出什么方案来。当时的文物工作委员会下设文物部、考古部、陈列部、保管股、侯马工作站、长治工作站、五台文物管理所等几个职能部门，文物部包括勘察组和古建组，考古部包括考古研究组和田野工作队，我同时兼任考古部主任。名义上这几个组（队）都是并列的，我们上报的人员构成也是混在一起的，但主要的田野工作还是在勘察组和侯马工作站。一开始，我完全是作为一个有点文化基础、有点历史知识的领导干部，派到考古所的。从 1958 年担任考古所所长，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段时间，是我在业务上的一个学习期。

1960 年到 1962 年的困难时期，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许多基建项目都下马了，许多地方的考古发掘也下马了。然而侯马的基建项目却仍在继续，1961 年，要建侯马电厂，大面积遗址面临破坏的危险，鉴于这里发现侯马东周遗址的重要性，文化部就把这里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组织力量，调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河南、山东、江西等文物部门的考古工作人员前来支援，对侯马东周遗址开展全面的考古发掘，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侯马大会战”。领导让我担任考古队队长，副队长有三位，即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同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彦煌同志以及侯马工作站站长畅文斋同志。没什么事，我就去侯马工作站蹲点。

从文管会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全省的田野调查和发掘项目主要有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侯马晋国遗址、匼河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长治分水岭墓地、万荣庙前东周墓地、司

马金龙墓等等，有些是主动性的调查发掘，有些是跟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陆续开展的，项目虽然不多，但都意义重大。那个时候的专业干部和技术工人很少，包括我这个所长都是在工作中暗地里下工夫、连学带问进了门的。而当时机关里的专业力量不强，为此国家文物局曾在1952年至1955年举办过四期田野考古训练班，我所的许多同志参加了培训，为我省积累了考古工作力量。

1964年，山西“四清”运动全面展开，组织安排，我只好暂时离开考古工作，到忻州原平县的“四清”工作队，我在原平张村任队长，负责那里的“四清”运动。工作之余，就又会到附近进行文化考察。张村考察可说是我进入考古这一行后，做的一次正规的古文化考察。

1965年12月中旬，我还在原平搞“四清”，得到消息说侯马电厂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些带朱色篆体文字的石片，我就向工作队请了七天假去看，经过辨认研究写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郭沫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也撰写文章并确定这些朱书文字为“盟书”。

“四清”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我也被扣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挨批斗、关“牛棚”。那段炼狱般的日子持续了六年有余，现在提起来就心口发慌，不用说工作了，连正常生活都没法顾及。直到1973年国家文物局王冶秋直接过问下我才恢复了工作负责侯马盟书的整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文管会也处于无领导、无组织、无科研的停滞状态，只有零散的一些考古工作在侯马进行。用“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1979年11月，省政府撤销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成立山西省文物局，原有的考古队、侯马工作站、晋东南工作站合并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重新挂牌，我担任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所所长，直到1984年退居二线。

十年浩劫总算过去，天公重抖擞精神，我们也迈开步伐向前进。新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山西的文物考古事业才真正走上正轨，发掘审批、项目管理、操作方法和专业技能各方面也逐步规范和完善。我们的工作重心又重新着眼全省，在继续“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发掘任务的同时，还发掘了娄睿墓、天马—曲村遗址、新绛柳泉墓地、太谷白燕遗址、垣曲古城东关遗址、潞城古墓等，从旧石器时代到整个历史时期都有涉及，尤其是在解决山西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位上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我们也与中央及全国兄弟省份加强合作交流，联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我是发起人和主席团成员之一，作为常务理事，共同致力于考古学科的建设和专项问题的研究。

从文管会算起，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已经是“人到甲子”，我也“期颐”在望了。作为考古所的一名老同志，回首考古所的成长，也是回溯自己的学术生涯，我进入考古行当起初都是组织安排，一旦进来就要横下心来、刻苦自修，争取做点成绩。现在的国家发展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山西的文物考古事业只能更好，同志们的学术成果也会更丰硕。

第二节 艰难起步铸辉煌改革开放初期的山西考古所——忆王建先生二三事

王益人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楔子

王建先生是我的父亲，也是山西省考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1953 年，他从山西省银行学校被调入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机缘巧合，刚到文管会就遇上由贾兰坡、周明镇先生带队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野外考察队来山西垣曲考察化石地点。考察队一行从太原到垣曲，过黄河在渑池县仰韶村与先期到达的裴文中先生汇合。考察结束后周明镇先生听说王择义先生 6 月份在丁村采集到一批象化石，从石家庄转车重返太原，王择义先生将象化石和几件石制品拿给周先生看。周明镇先生翻译过奥克莱的《石器时代文化》，对旧石器有一定的了解，但还是谦虚地说拿不准，带回北京请裴文中、贾兰坡两位先生做进一步的鉴定，11 月底北京方面传来喜讯确认丁村发现旧石器。旋即文管会领导决定派王择义、王建前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王择义先生主攻动物化石。家父跟随裴文中、贾兰坡学习旧石器考古，开始了他 55 年的考古生涯。

我从 1982 年进所跟随父亲学习旧石器，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了 20 多年。2009 年家父驾鹤西行，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施联秀局长曾跟我说：“益人，你父亲是对山西考古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你应该把他的事迹好好写一写。”但我却迟迟无法下笔。今年所庆 60 周年，所里要求大家写回顾文章，我想起 1994 年张守中先生参加“丁村文化与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与家父的一席话。张先生说：“老王，山西考古所最艰难的时期是你们当政的那几年。建了一栋办公楼，进了一批大学生，置办了偌大一个图书资料室，给考古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话近来一直萦绕在耳边，我想还是把它写出来吧！

起航

1979 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神州大地吹响了科学春天的号角。在这号角声中，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恢复建制，第一次以独立机构的身份担负起三晋大地的考古工作。

众所周知，成立于 1952 年的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勘察组，是最早负责山西省地下文物勘探、调查、发掘的考古机构。1958 年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后，与勘察组（后改为考古队）一直属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79 年 11 月，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撤销，成立山西省文物局，原有考古队外加侯马工作站和晋东南工作站合并为新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由省文物局副局长张颔兼任，王建任业务副所长主持工作，彭城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副所长。那时，全文物局只有一栋办公楼，文物局在一、二两层；考古所在三层的东半部和四层的西半部，古建所在三层的西半部和四层的东半部。业务骨干全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国家文物局第一至四期“考古训练班”的学员，所里的年轻人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批复转军人。

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山西一直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工作的核心地区，旧石器考古开展得比较好。因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旧石器考古研究室——即第一研究室，室主任最早由王建兼任，后由王向前负责，成员有陈哲英、丁建平。第二研究室（新石器考古研究室），当年只有王克林一人。第三研究室（商周考古研究室），由陶正刚负责；成员有叶学明、罗新、张崇宁。第四研究室（秦汉-唐宋考古研究室），由戴尊德负责；成员有朱华。技术室的队伍很大，有马刚、李夏廷、商彤流、畅红霞、李建生、海金乐、张俊才、吕金才等，负责绘图、照相、文物钻探和修复。邓林秀、于生才任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李梅贞为资料室负责人，与冯应梦负责图书资料的收集整理。侯马工作站有杨富斗、吴振禄、胡晋彪、梁子明等，主要负责侯马市及其周边地下文物的考古工作。长治工作站（又称晋东南工作站），只有李奉山等几个已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1982 年石卫国主动要求到长治工作站工作，与杨林中一道担负起长治工作站工作。这样的构架一直延续到 2007 年。

人才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压抑了十年的神州大地焕发出新的光芒，到处是建设的场面。考古也走向了“四化建设”的第一线。大量基本建设项目投入，使考古所的田野工作应接不暇。人才的断档是可怕的，这一点王建先生最清楚。1980 年，虽然还处在“配合基建”考古高潮来临前夕，但他已经觉察到人才短缺的压力，派商彤流、张崇宁、海金乐、李小克等到吉林大学进修田野考古。1982 年，山西大学考古专业第一批学生毕业，那时大学毕业分配，要到省计委和人事厅跑指标，考古所一下子要来了 6 个大中专毕业生。

记得父亲当年说过：“6 个太少，给 10 个我都要。”

1982 年 3 月，配合南同蒲复线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拉开大幕，叶学明、罗新和侯马工作站对北坞古城进行勘探发掘。与此同时，中美合资平朔露天煤矿在京签署协议，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一个引资项目，总额达 8 亿美元。经雁北文物工作站和朔县文化局调查“平朔露天煤矿”行政生活区、仓库区正好位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马邑汉墓群范围内；而安太堡矿区有战国至辽金时期的墓葬。1983 年 1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平朔煤矿达成协议：省考古所负责在五一劳动节前，完成行政生活区 300 座墓葬的考古发掘，保证基建队伍能按时进场。这几乎是一个带有政治任务色彩的考古项目。3 月的塞外还是一片天寒地冻的景象，平朔考古队调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 50 余名考古人，山西大学考古专业 78 级毕业的学生几乎全部汇聚到这场大会战中。

1983 年配合南同蒲复线工程也在火热进行中，北坞古城遗址发掘需要大量的考古人员，恰好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 80 级学生需要实习，三校考古专业师生计 83 人参加了这场会战。这年马、王万辉、侯毅毕业分配到所里工作。侯毅到了侯马北坞。马、王万辉参加了襄汾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当时参加发掘的有吉林大学的陈全家、徐光辉，我所的海金乐、张童心、李小克、吕剑峰和我。此后，海金乐、马、王万辉被分配到第二研究室从事新石器考古；侯毅被分配到第三研究室从事商周考古。

图书器材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考古所真用得上“一穷二白”这四个字。作为一个研究所没有图书资料是无法做学问的。据邓林秀先生讲：“买书配杂志是你爸的主张，考古类的杂志咱们订得最全，《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杂志，从创刊买起，买不到的就复印。1980 年～1983 年，每年花在买书上的钱有 10 余万、甚至 20 万。《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中华大辞典》、《中国美术全集》、《十三经注疏》、《中华大藏经》等大型类书、工具书买了好多。到后来这些书都买回来了，没什么要买的了，买书的步子就小一些了。”这一举措成了考古所的传统，到 1986 年我所的图书室几乎占满了三楼的十几个房间。

另外一个就是照相器材。搞考古离不开照相机，原来的考古队只有几架很老的相机（一架莱卡 135 相机和几架海鸥 120 相机）。随着平朔露天煤矿和南同蒲复线工程考古发掘的进行，相机远远不够用了。但照相机属于“控制性办公用品”不好买。尽管如此，所里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买了一大批照相机，除了梁子明、王传勋、李建生三个专业照相人员配备了高级专业相机外，老一批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每人一台日本相机，这在兄弟省市的考古队伍中也是令人羡慕的。

库房楼

1981 年，省文物局决定改善办公条件，将当年的建设项目给了古建所，在王村南街新建。1982 年的建设指标给了考古所，在文物局楼后的空地上新建库房楼一栋——就是我所现在的办公楼。当时还属于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手续和建筑材料都是由省计委批。计委给的指标是三层，父亲曾在银行工作过，计委有一帮老朋友，软磨硬泡批成了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父亲做事情有两个特点：一是说一不二，不管什么事情，他一旦决定下来，很难有人能改变；二是亲力亲为。库房楼是由山西省建筑设计院的王爱华设计，父亲想把楼的地基做成能够承受五层楼的基础。图纸会审是建设前的最后一道手续，会审结束后考古所在桥头街的清和园饭店请了一顿饭。那个时候会计制度很严，饭费没有办法下账，父亲用一笔稿费加上办公室卖旧报纸的钱付了费。工地的管理由基建办主任于生才先生负责。记得办公楼是 1983 年 6 月份破土动工的，父亲每天都要到工地上看几趟。打地基的时候他一再要求多加钢筋。工程监理说：“其实用不着那么多。”他就是不听，硬是把十多吨钢筋放到地基里去。进回来的钢筋、水泥本来是工程队的事情，父亲也要亲自过问，水泥的标号一律用 425 的大水泥，小水泥一概不用，弄得施工队很不高兴。那年夏秋雨水特别长，他生怕被雨淋了。有一天一直到晚上 9 点多卸完货后才回家吃饭，我去了好几趟都叫不动。因此感动了施工队长，以后他再到工地指手画脚施工队队长也就不生气了。作为文物库房，楼板设计的标准提高了很多，据邓林秀先生讲，当时他们要求楼板的承重要能够达到 500 公斤/平方米。先前建设方预订的预制板差一点没能达到这个标准，预制板已经拉回来准备起吊，又全部退回去，改成了现浇楼板。

1984 年父亲虽然退居二线，但仍然十分关心库房楼的建设，直到 1985 年建成竣工，他才安心地开始考虑做学问的事情。

第三节 四面开花八方齐鸣

第三节 四面开花八方齐鸣——忆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发展（1984-1992）

口述：王克林 整理：郑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2012 年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无独有偶，今年也恰是我与考古结缘 60 周年。对我来说，回忆这段往事，尤其是自己主持工作那几年，可谓千思万绪、百感交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